

道風山主任訪問記

(註：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主任李景雄博士於本年五月四日接受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梁潔芬修女訪問，發表有關該叢林的研究所在，中國基督教會與國外教會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研究所對中國教會所採取的態度。)



◀ 李景雄博士伉儷攝於道風山

梁：李牧師你在中國問題上研究了十多年，請問你研究的目的是甚麼？

李：你說研究十多年真不敢當，在道風山研究社我服務了八個年頭。在未開始談話前，請澄清「中國問題」四字所包括的是甚麼？因中國問題所涉範圍非常廣濶，若把它縮窄在一處較易討論。

梁：既然李牧師是教會內的工作人士，當然興趣的焦點應放在宗教問題上，或者是與中國有關的神學問題上，是嗎？

李：在宗教問題上可分幾方面去看，一方面指中國的教會，它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新教，我是新教徒，故側重於新教方面，這並不等於我們不理會天主教在中國之情況。

另一方面，「宗教」一詞除基督宗教外，亦包括其他信仰，例如佛教、回教、道教等亦是我們關注的對象。至於資料方面，我們盡量去尋找，其中很有價值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國內「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的資料，關於這點我未有仔細一一作研究。若有充足人手，最好能親自到中國與他們接觸，作實地研究。還有中國政治社會及經濟等問題

都在研究範圍內。我們雖然不以專家的姿態出現，對以上問題仍需作全面性研究，因為宗教不能從中國整個局面抽離。例如，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是與社會和政治氣候相配合的。關心中國的宗教並非是指只關心天主教及基督教，我們亦關心國內宗教如何影響大眾之前途及福利。我們在研究中國的宗教問題上涉獵的範圍很廣。

至於研究的目標，我們是個基督宗教機構，我們有信仰的立場。關心教會組織的情況、困難和遭遇是我們份內之事，但這種關心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進一步來說，因教會內有人存在，而教會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生活，很自然引起我們關心中國同胞的遭遇及前途，甚至中國文化之前途，或其他與中國同胞牽連其中的事件等。但這些關心亦非我們的最終目標。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走到廣義的基督宗教信仰裡（並非組織性的教會），意即：並非單單關注那些已經加入組織性教會的弟兄姊妹，而亦關注一切中國人的前途問題，這裡亦包括擁有絕大部份未信者之社會內基督宗教的存在有何意義和如何發揮的問題。不論在人權問題上或者是在文學的流露中，我們均可見到中國人的苦難、希望和掙扎，這是基督徒應關心的問題，我們試從神學的角度去反省這些人生問題。所以可以說我們研究的對象無所不包。

梁：閣下研究的最終目標都是回歸基督宗教方面，所以你多年關心基督宗教在中國之處境；以往基督教在國內隨着政治氣候之變遷而有不同的遭遇，過去有人主張走福音派的路綫，亦有人主張走三自運動的路綫，那麼今後基督教應走甚麼路綫？

李：你說福音派及三自運動，三自運動其實包括三自愛國會及基督徒的愛國運動，在這裡我們不準備詳細討論這些問題，因讀者已很熟悉，但完全不提及而懸空地討論國內的基督宗教又不可能，那麼我們就簡潔的就這些作反省。中國宗教政策在過去有鬆有緊有反有覆，現在可說是屬「鬆」的階段，但是宗教自由的幅度有多大呢？真是見仁見智。無論如何，宗教自由是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因此其思想路綫有很濃厚馬克斯主義的意味，那麼在這些國家中對宗教一定有某種的看法。它們對宗教的看法很顯明的與西方國家有異，覺得宗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東西，對宗教並非有真正的尊重，若政策收緊時宗教就馬上受到排斥或肘掣。

梁：為何共產主義國家對宗教採「無可奈何」的態度？

李：這個問題有很長遠的歷史，譬如有些人說，宗教是人造出來的產物。就算有很多社會情況已經改善了，人因其軟弱之故，宗教仍需很長時期才被掃除淨盡，所以他們索性認為歷史上有一大段時期都有宗教存在。

在現階段中的中國，不會猛烈攻擊宗教，給宗教一個機會去享有限度的自由。若果我們在海外的宗教人士及國內的宗教人士有意挑剔當局說：「我們不承認你對我們的看法」反為對宗教不利。當然利與不利的界綫很難分，甚麼時候可起而反抗，甚麼時候才容忍，都沒有鮮明的界限。就是因為這緣故，我們說到宗教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微妙關係。有時教會處於忍無可忍的狀態，有時需要蟄伏一個時期以昭光養晦，有時政教可共存，這需要高度的智慧去判別。所以在國外的有心人士不可輕率的去騷擾他們（「他們」是指政府及國內教會雙方面），不可干預他們，使他們受不必要之麻煩，令政教關係倒退。

梁：你覺得以往外面有人會騷擾過國內的教會嗎？

李：有，明顯的例子是偷運聖經事件。因國內教會及政府雙方已說明得很清楚，在這個調整

時期，在三自的原則下他們會盡量供應聖經，政府不許可偷運，有明文規例發表，亦着意執行，但偏偏外面的人士以一百萬本的聖經偷運入大陸，這很明顯的是干涉別人的教會了，對中國教會太不尊重，這樣產生很多的反效果。還有其他很多小動作亦是很微妙的，何事算反革命，何事屬宗教自由，要因個別情況而定。說來說去宗教團體及政治團體的關係是很微妙，在中共有特殊的機構，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綫」部門。假定在某一時期統戰政策能團結其他黨派人士的話，這樣會給宗教一個很好的機會。究竟「統一戰綫」是甚麼，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們在國外有很多種解釋，而且每個人在解釋中滲雜了個人情緒在內。

梁：李牧師可否介紹道風山及其中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心？

李：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之建立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由挪威傳教士艾香德博士創辦。他對佛教有濃厚的興趣，特別與佛教人士接觸交談。艾博士歿後，工作方針就有各方面的調整。現有的「瓷器部」是在五〇年代建立的，當時有難民從大陸逃到香港，他們當中有些是佛教徒而皈依基督教者，他們靠着繪製瓷器的收入以糊口。基督教方面並請他們繪畫有宗教意味的瓷器，成為屬於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工作之一。還有這個研究中心，它本來不是屬於道風山的，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立，名為「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從其名稱我們可略知其研究工作範圍，它在研究中國宗教方面，不僅限於佛教，而且兼顧佛教以外的宗教，如道教、回教、及其他民間宗教等。至於中國文化方面所包括的領域非常廣袤，由於歷史之發展，我們於七八年前開始注意中共的情況，當時國內教會還未開放，而香港教會方面對這方面仍未會有多大的注意，而我們又因為沒有教會中某些約束，因此可以自由的去幹研究工作。直到中國教會享有較大的自由後，才得到較多資料。我們發覺有些事件非注意不可。道風山的研究中心於去年與原來的機構再結合，成為三個部門，即瓷器部、研究社及退修所及附屬的崇拜小堂。至於退修所方面，因為我們很注意靈修問題，但由於人手短缺，不能在這方面大加發展。但我們仍舊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條件下，使這退修所成為反省以及追求靈性的地方。若人手充足的話，我們在退修所方面的成就會有更佳表現。

梁：你剛才說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有些資料顯示有「非注意不可」的事件，要追蹤注意的，這是甚麼事件呢？

李：雖然我們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但我們仍有心理準備，去接納我們所知的原來很有限。過去三十年中，中共在中國進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而且國內一切事物都在演變當中，我們手頭上的資料很有限。需要對事件作出某些評價及發表意見時，我們只能根據有限資料作評論，但我們並沒有任何企圖及動機，譬如主動地利用國內情況去發動傳教工作等。我們只希望了解和關心，從大處着眼去看問題。雖然我們自己不去直接傳教，但是關心在這體制下「宣教」的意義。因我們有這樣的態度，所以與大陸教會人士接觸時，自然會與他們建立信任及友好關係。我們身居在國外，真的不能完全了解大陸的情況，但是我們處處從大處了解，尊重接納他們，對事件用公道的眼光去看，因此能夠和大陸基督教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我們與丁光訓主教及三自愛國會的領袖的見面不太頻密，但每次接觸時，無論在來往的書信中以及在不同場合的見面中，我本人覺得大家很容易產生信任的態度，這樣使我們比較容易做橋樑的工作。

在資料方面，我們若發覺有代表性的文章，而中國教會亦覺得是可以給我們分享的，很自然的我們會取得他們的信任而獲得作翻譯及轉載的准許。我們當中回國觀察後，所寫出的報告，港方人士及國內教會未必全部同意我們的看法，甚至「景風」所刊某些作者的意見也未能全部與國內教會吻合，但都不惹起反感。最重要者還是態度上的問題，我們以友善的態度和中國教會接觸，因此不會被局限在一條路綫上作單方面發展。我們不敢說我們的資料很多，但我們不會被逼止於某一種看法的資料之前而無其他選擇。

梁：剛才你說道風山正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作橋樑是很困難的，常常做「吃力」而未必「討好」的工作，請問在現階段中你們所遇到的困難是甚麼呢？

李：作橋樑真的是困難重重，工作固然「吃力」，但所花的心血並非徒然，若想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的話，需要高度技巧及智慧，要做得恰到好處方可。若做得好的話，幾方面的人士都會欣賞的。

在困難方面這是必然的，因各人有不同的觀點，在各人不同環境及歷史背景下，當然對中國教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並不意味着困難能嚇退我們不去作甚麼事，但我們需要很大的耐心及高度的技巧，在困難中工作。單從研究的角度去了解與我們社會不同的事物已經困難，何況在了解以後要再進一步作橋樑、作溝通的接觸點呢？困難是自不待言，但我們的宗旨是如何在困難中做點有意義的事。

梁：你們面對的困難是甚麼呢？從那方面來的呢？

李：在香港研究國內情形已經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是第一個困難。因為我們與國內人士的觀點與角度不同；若想進一步將研究所得的結果表達而令教會人士明白，這是很困難的事。這個中心是為教會服務的，因教會中例如堂口牧師及神父在實際情況中無時間及缺乏種種的方便去研究中國問題，另一方面教會是一龐大的組織，凡有龐大的組織就有勢力的形成，而組織越龐大，意見越分歧，而且意見中有受某種條件所限制，形成一種勢力，若在教會中作研究工作，很難超越這些限制，但並非完全不可能。這並非說我們的研究中心已經完全超越這些困難，毫無偏見的去研究。但比較上我們可較為超越，因此能有較為清晰的看法，但我們還需協助其他人去看中國問題，這就是我們困難之所在。事實上，要協助人在很多限制中超越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這需要意識上的醒覺（CONSCIENTIZATION）。舉辦研討會、個人的聯絡、討論、共同在一事件上的合作，是培育的最好方法。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當中國基督教代表團去年訪港時，道風山大可以單獨作接待工夫及安排一切，但我們願意與本港各方面一起合作。單是如何與本港教會達成協議去安排一切已經不容易，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也使到各方面都得到益處。因為中國的教會代表到香港來，所以香港教會同工方面非要共同決定一些接待方法不可。事實上，有些人不願意做，有些人害怕，有些人不知如何去做，但最後大家都一起携手去面對接待的問題。其實道風山有能力做接待工作去安排一切活動，但我們給予香港教會一個去面對中國教會的機會。若有批評大家一起去負責，若有功勞大家一起去分享。從上次的接待結果去看，我們發覺收了培育意識醒覺的效果。在中國教會方面他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而來，我們在這點真的起了橋樑作用，我們去鼓勵中國方面放心作第一次的接觸，我們會從旁協助。

梁：李牧師你在這個橋樑角色上扮演得很好，我們天主教會方面也需要一些人作橋樑的角色，希望李牧師今後能多多指導我們如何在這方面去努力。謝謝。